

马克思的“纠结”与化解

——基于俗世生活的关怀视域

王习胜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马克思; 俗世生活; 人文关怀; 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 从俗世维度认识马克思,他也有“现实的人”难免的纠结,比如,与亲人之间割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为吃喝穿住难以为继的无奈愁苦;与曾经的同志因道路分歧而发生的争吵。认识“纠结”的马克思,不是要祛魅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光环,而是要以其原初的生活史充盈他由俗世常人脱颖而出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人文品格,以关怀的情态感悟伟人生活的艰辛和意志的坚韧。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17-07

Marx's Entanglement and Resolution—Based on Care of Secular Life

WANG Xi-sheng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Marx; secular life; humanistic ca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From the secular life dimension, Marx also has inevitable thought conflict like “person in reality”, for example, motional entanglements with relatives; unsustainable helpless sorrow in livelihood and fierce quarrel with comrades due to differences of revolutionary road. Understanding Marx's “entanglement” is not to disenchant him as a divin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and scientists, but to take its original life history to fill his humanistic personality from secular life and develop into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mentor, and feel the hardships and life's tenacity of great men in history.

认识马克思有很多维度,可以从经典著作中认识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也可以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中认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还可以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史中认识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但是,通过这些路径认识到的马克思,展现的主要是在书房中抽着雪茄写作、与恩格斯一起踱步深思、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马克思,是剥离了俗世琐碎生活的、具有某种神性光环的马克思。其实,认识马克思还有其他的维度,比如,俗世生活的维度。从这个路径认识马克思,他与俗世常人并无根本差异,他也有生活和生存的烦恼,甚至有比常人更多的情感纠结。^①了解马克思如何面对俗世生活中的烦恼和

纠结,有助于我们发掘马克思在生活和生存态度方面的精神遗产,亦可为当下处于生活压力和生存焦虑中的人们提供一幅直面人生困境的镜子。

一、亲情与爱情的纠结与化解

每个人的情感都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生成乃至纠结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首先发端于他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实体,维系其成员的精神纽带是“爱”,而家庭成员之间的许多情感纠结也都生发于“爱”——爱的愿望、爱的能力、爱的表达和爱的实现。马克思与其亲人之间的情感纠结也不例

收稿日期: 2016-09-19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KS013); 安徽省宣传文化领域拔尖人才(社科理论类)项目

作者简介: 王习胜(1965-),男,安徽舒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悖论、辩证法、意识形态和思想咨商。

^① 马克思的情感生活与燕妮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情感纠结不可能不与燕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而本文没有对某些“纠结”问题在马克思夫妇之间作徒然的分割。

外。这里我们姑且追溯几例马克思与其至亲在情感方面的纠结与化解的事件。

其一，马克思母子之间的情感纠结。《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被现时代无产阶级宣布为自己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却出身在一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1]2}的确，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不仅给少年时代的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逸的生活条件，也在思想上宽容并引导着马克思的发展，但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毕竟只是一位生活在俗世社会中的家庭主妇，其思想觉悟不可能跟上马克思的追求。在马克思的父亲过世之后，其母要在并不富裕的家境中养育除马克思之外还有七个时常生病的儿女，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下，她很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将精力用在批判现实社会制度上，而不好好挣钱养家，承担起自己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由于马克思没有听从母亲的意见，他的母亲为此而将其“执着”归咎于时为马克思未婚妻的燕妮，责备她没有把自己的未婚夫引导到“正途”上来，致使燕妮和马克思都“被迫夹缠在不必要的和耗尽精神的争吵里面”^{[2]37}。1842年6月底，马克思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断绝了家庭对他的经济支持，也不让马克思继承其父的遗产。马克思从外地回乡时，因为这种“不愉快的家庭纠纷”^{[1]39}而不得不寄宿到一家小旅馆中。母子之间的不愉快持续了将近20年。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调解人，母子之间的龃龉逐渐在牵挂中消磨，1863年底，也就是在马克思的母亲去世前两年，母子俩终于言归于好。

其二，马克思夫妻之间的情爱纠结。马克思与燕妮之间的爱情被世人称颂，但马克思与燕妮之间也不是没有情感纠结的。燕妮出身于贵族家庭，不顾族门的强烈反对而下嫁马克思，必然要遭到世俗的刁难。经济拮据的马克思难以给高贵的燕妮以豪华的结婚仪式——燕妮的母亲为了避开世俗的人们对其女儿婚姻的非议，只能将他们的婚礼安排在远离家乡的克罗茨纳赫举行，婚礼上除了燕妮母亲威斯特华伦太太和其弟埃德加尔之外，双方家族没有其他人参加。冷清的婚礼之后燕妮便开始了饱受艰辛的贫苦生活，跟随着马克思颠沛流离。马克思曾经内疚地说“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了”^{[2]159}，因为他让燕妮触上了毁灭她一生的暗礁。除了这

份生活贫苦的歉疚之外，马克思与妻子之间至少还有三次较为严重的情感危机。

一次是传闻马克思的婚外情。燕妮曾经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1]248}在西方学界，大家基本认定“这件事”就是马克思与其岳母派送来的佣人海伦·德穆特发生的婚外情。1851年6月，海伦·德穆特的私生子弗雷德克出生。在孩子出生的第5个星期进行人口登记的那天，马克思曾给其思想的追随者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污蔑我”，“我的妻子正在生病……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1]249}这场夫妻情感危机的化解，一是得益于恩格斯主动揽过；二是马克思表现出来的对燕妮更多更真诚的爱——“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时，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1]249}

另一次是马克思要宣布家庭破产。长期的贫苦，孩子接连夭折，沉重打击了燕妮。1863年初，家庭的贫困几乎使燕妮的精神完全崩溃，马克思准备在法庭上宣告自己破产。这个破产宣告虽然可以让马克思不用支付债权人的债务，但必然要将他的两个大女儿抛向痛苦的深渊——只能到阶级敌人家里屈身为奴，做类似于女佣的家庭教师，接受没有人道可言的轻视、压迫和折磨。而马克思夫妇和小女儿爱琳娜只能迁入贵族慈善家舍夫兹别利勋爵建立的工人公寓^{[2]161}，这是燕妮不能接受而且强烈反对的做法。这次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是恩格斯采取了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借贷了一大笔钱给马克思才挽救了他的全家。

再一次是关于小女儿爱琳娜的婚姻的问题。爱琳娜17岁时爱上了34岁的法国巴斯克人普罗佩斯·利沙加勒。利沙加勒是一名巴黎公社委员，也是一名新闻记者，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有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马克思与燕妮在爱琳娜的婚姻问题上存有分歧。马克思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甚至要求爱琳娜陪伴着自己，禁止她去见利沙加勒。燕妮则强烈反对她丈夫的做法，她宣称是唯一理解女儿的人，并且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探望爱琳娜。^{[1]389}这件事情造成了马克思夫妇之间的不愉快，也给马克思与爱琳娜父女之间造成了无论怎

么体贴也难以彻底消除的情感阴影。爱琳娜曾说，为了不让母亲和父亲难过，我牺牲了我最好的、最新鲜的年华。^{[1]390}

俗世家庭生活免不了争吵，马克思夫妻之间的情感纠结之所以不会动摇他们结合的基础，是因为他们两人在为人类幸福的未来搏斗中有着对人生意义完全一致的看法。大凡关系到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作出牺牲，关系到为社会主义目标贡献力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分歧。^{[2]166}

其三，马克思与其子女之间的亲情纠结。马克思对子女最为深重的亲情纠结就是他对孩子们的爱无法很好实现。女儿们到了如花一般的年华，她们的同学可以在公众场合体面交往，尽情享受青春乐趣，而他的孩子却因为缺衣少穿而不得不小心地回避，甚至不能有尊严地去上学……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孩子们不仅患上了贫血、咳嗽、虚弱……的“无产阶级病”^{[2]158}，还直接威胁到生命。马克思一生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孩子在贫困交加中夭折。第一个夭折的孩子是小福克斯，死于1850年11月19日，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我们感到非常孤独。^{[2]122}第二个夭折的孩子是小弗兰契斯卡，她只活了一岁，在1852年复活节时死去。当时，家无分文，燕妮多方讨求，许久之后才以极为悲痛甚至是害怕的心情在一位法国流亡者那里借到两英镑，买了一口小棺材：“她出世时没有摇篮，就是这个最后的小窝也耽搁这么久”^{[2]134}。马克思最为痛爱的孩子埃德加尔^①是1855年4月初夭折的。这个孩子就死在马克思的怀中。马克思的痛苦可以从其1855年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看到：“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2]13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丧子之痛中挺立过来，支撑他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2]135}当然，大女儿燕妮和二女儿劳拉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后代和家属，他们遭受的生存威胁和生活贫

困，也是马克思一生为之牵肠挂肚的事，而大女儿燕妮39岁英年早逝更是让马克思饱受老年丧子之痛。

二、生存和生活的纠结与化解

燕妮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为多少年来所作的牺牲和所忍受的痛苦过于小题大作；公众是很少或者几乎完全不了解我们的私事的”^{[2]117}。因为宣传和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所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很少能够体悟到马克思在生活和生存方面的艰难与纠结。我们仅从如下三个方面作简要说明。

其一，刻薄的世俗流言。舒畅的生活离不开和谐的社会环境，而马克思一家却始终生活在世俗的嘲讽和流言之中。1844年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由于孩子身体虚弱，家庭经济又遭遇危机，燕妮不得不回到境况相对宽裕的娘家以度时日。在家乡，那些世俗的人对她品头论足，经常提出一些难堪的问题为难她。为此，燕妮用几件巴黎时装和一顶法国头饰将自己扮装成一个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的妻子，“给他们最好、最深刻的打击”^{[2]50}；1848年夏，普鲁士军队镇压了马克思家乡特利尔市民自卫团的起义之后，燕妮再次带着孩子回她母亲家中以缓解自己家庭的经济压力。“市侩们对待她的却是恶毒的眼光，尖刻的注视，假惺惺地问候她丈夫，成千次的讽刺，当她接近时后沉默不语……”^{[2]111}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当地政府甚至也散布起马克思的流言蜚语，说他是煽动非法公社运动的首领，已经被捕了，以致很多邻居都不敢与马克思家有来往。更有甚者，马克思的反对者还硬说他和他的家属挥霍了流亡者的捐款，说他拿革命做交易。^{[2]130}如何面对这些非难和流言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总结说：“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诬蔑最多的人……无论保守的资产者或极端民主的资产者都争先恐后地纷纷诽谤他，诅咒他。他把这一切当作蛛网一样抹去，不予理睬……”^{[3]678}，马克思甚至把它们看作其“人生观即将大获全胜的先兆”^{[2]112}。

其二，愁人的吃喝穿住。长期处于流亡和旅

^① 男孩“埃德加尔”是与燕妮的弟弟同名的，外甥与舅舅同名是马克思和燕妮有意这样取名的。在幽默氛围浓厚的马克思家里，埃德加尔也有绰号，叫“穆希”，意思是“小麻雀”。

居状态的马克思,因为吃喝穿住而频繁发生最不愉快的争吵和令人难堪的局面——被房东扫地出门,货主赖在家里要钱,警察和法院的估价员轮番登门……先前解决这些难题的主要出路是去当铺,典当燕妮的陪嫁品甚至是家人的衣物。由于与当铺接触过多,以至于孩子们都称典当行的人为“叔叔”。一次,马克思家因为典当刻有阿盖尔郡^①贵族图饰的银器,被典铺怀疑来路不正而通知了警察,在马克思未能证明自己是诚实的之前,还不得不在监狱里度了周末。^{[1]241} 18世纪50年代在伦敦第恩街生活期间,穷困潦倒的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当了外衣,在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时,甚至因为没有裤子和鞋子而出不了门。^{[1]241} 1852年9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你的来信。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2]131} 正如曾经去过马克思家的俄国法学家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所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富裕过,却不少于贫困”^{[2]263}。

其三,终身难归的祖国。1845年1月底,因为主编《莱茵报》和《德法年鉴》被迫移居巴黎的马克思,普鲁士国王仍然没有放过他,交涉法国政府驱逐他。马克思不得不前往比利时。在比利时,普鲁士政府又向比利时政府提出引渡要求,逼迫马克思不得不放弃普鲁士国籍。后来,在普鲁士政府不得不采取自由路线时,马克思多次想恢复普鲁士国籍都没有成功。^{[2]56} 为了在必要时能够返回德国,直到1862年,马克思仍然没有放弃申请恢复国籍,但普鲁士当局始终拒绝。此时,燕妮也掩饰不住痛苦情绪,在给她的朋友贝尔塔·马尔克海姆的信中愤怒地说:“在外国,你是一个德国人,尤其有幸是一个‘普鲁士人’,几乎要为此感到羞愧……”^{[2]216} 因为健康原因,1874年马克思不得不去疗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只能申请英国国籍,结果也被

英国政府拒绝。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马克思的信息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彰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1]397}。最后,马克思只能用“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在名册上登记,“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1]397}。直到马克思逝世,他仍然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这对怀有深厚爱国之情的马克思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终身憾事。

三、友情与事业的纠结与化解

在马克思交往的友人中,有些人的生活经验浅显、思想观念单纯,比如诗人海涅,这些人得到了马克思及其家人亲人般的安慰;有些人很忠诚,比如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活动家威廉·沃尔弗,将其节俭一生的遗产留给马克思,挽救了马克思的事业^②;有些是被驱逐的流亡者,他们把马克思家当作“正义避难所”,这些人或是受到多日接待,或是得到忠告和帮助,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太过自我,比如,自称是马克思学生和拥护者的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后来演变为机会主义者的斐迪南·拉萨尔,他在马克思家住了数星期之久,却不顾马克思困难的家境而提出过分的要求,让马克思家人惴惴不安;还有一些人,把马克思的真诚帮助和劝告视作与其争名夺利,甚至不惜侮辱马克思的人格,比如,早年崇拜马克思,后因嫉妒马克思而执意孤行的德国流亡者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再如,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建议而自命不凡的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此外,还有由求教而抄袭马克思思想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亨利·迈·海德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过:马克思“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3]678}。那么,马克思是怎么处理友情的呢?这里不妨通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卢格和库尔曼等人交往的个案,呈现马克思化解友情纠结的主张和风格。

其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冯·

^① 这件器物是燕妮的奶奶珍妮·威沙特的陪嫁品。珍妮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的后裔。此银器是冠形的,曾被马克思和燕妮多次典当应急。

^② 1863年马克思试图以宣布破产的方式躲避债务,后来是恩格斯施以援手而使全家幸免灭顶之灾。1864年马克思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十分糟糕。1864年5月14日,马克思的忠实良友威廉·沃尔弗的去世,他将为自己多年节蓄的1000多英镑留给了马克思家,使得马克思能够继续从事《资本论》的研究。1867年《资本论》出版时,马克思为了纪念威廉·沃尔弗而在《资本论》第一卷扉页上题词:“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无产阶级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

恩格斯（1820—1895）是德国思想家、革命家和哲学家。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亲密的战友，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提琴手”，更是马克思全家人的挚友。恩格斯的每一次造访都给马克思家带来快乐，孩子们尊称恩格斯为她们的第二父亲。这不仅是因为恩格斯无数次地解救了马克思家的经济困局，更因为恩格斯的坦诚和智慧深受马克思及其家人的信赖。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恩格斯在马克思家的地位——在保尔·拉法格向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求婚时，劳拉在恩格斯对她的婚约表态之前一直没有答应拉法格。^{[2]193}毋庸讳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也有不愉快：1863年1月6日，恩格斯的妻子玛丽·白恩士突因心脏病去世，恩格斯感到非常悲伤，写信向马克思倾吐伤感：“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2]159}。当时，马克思家里极度艰难，燕妮到巴黎向马克思的一位富裕的亲戚求助却两手空空地回来，债主登门，家里还坐着法院派来的清算家产的估价员。^{[2]159}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只讲了寥寥数语哀悼的话，之后，便大谈家里的绝望困境。这让恩格斯特别痛心。1月24日马克思诚恳地向恩格斯认错：“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为震惊，就象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2]159}马克思的真诚道歉，化解了恩格斯的不满：“……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了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2]160}马克思对恩格斯不仅有感激之情，还有歉疚之意。在《资本论》第一卷印刷期间，马克思曾从德国汉诺威写信给恩格斯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象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方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2]224}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份友谊因为真实和坦诚而经得起任何风浪与时间的检验。

其二，马克思与卢格。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是德国政论家，早年是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被称为“黑格尔学派的看门人”。他从黑格尔哲学和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和批判社会政治问题。早在1837年，马克思也

曾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所吸引，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讨论活动，向该派领袖人物卢格寻求过建议和帮助，卢格一度也是马克思的良师益友。这段友谊也促使了马克思与卢格的短暂合作。1843年，马克思担纲的《莱茵报》被查封，此时燕妮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马克思急需一份薪水来养家，也需要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来继续他的事业。经过与卢格拖延时日的谈判，1843年8月，卢格决定聘请马克思主编《德法年鉴》。在1844年《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也是最后一号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仅提出了把批判武器对准德国的反动制度，而且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11}的革命思想，导致卢格的不满，使之转过头来反对马克思。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主要在于：卢格只想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理论的方式批判现实社会制度，并不想把理论批判推向实际斗争，不想打破旧世界去建立新世界。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卢格当然不希望无产阶级参与到现实社会制度的改革运动中，不希望社会通过革命的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由于这是政治原则分歧，在普鲁士国王指示他的官署查禁《德法年鉴》时，马克思毅然离开了编辑部。年鉴停刊，卢格反目，事先允诺给马克思500—600塔勒的年俸不再用现金支付，而是厚颜无耻地用若干份年鉴抵薪，两位曾经的同路人最后分道扬镳，成为论敌。

其三，马克思与库格曼。路德维格·库格曼（1828—1902）博士的职业是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德国社会主义信奉者。在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后，1862年库格曼开始同马克思通信，积极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1867年4月，马克思为了亲自监督《资本论》第一卷的印刷而回到德国，受到库格曼一家的亲切接待，他把这次逗留看作是“生活沙漠中最美丽动人的绿洲”^{[2]224}。库格曼是信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但不赞成马克思身体力行，更不欣赏燕妮也参与政治活动。库格曼认为，燕妮也是属于把马克思拖进政治活动中去的那些人。^{[2]255}在他看来，马克思应当脱离阶级斗争，只作为书斋中的科学家进行工作，因而“竭力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1]398}。

其实,马克思早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哲学家进而理论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在一次疗养途中,马克思与库格曼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由于这种不能妥协的政治工作取向上的分歧,他与库格曼分手了。

四、马克思化解“纠结”的主要路径及其启示

面对俗世生活中的纠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法,马克思在应对纠结时有“外力”的辅助,比如,燕妮给予的赤诚的爱,恩格斯不遗余力的援助;马克思也自己控制情绪的技巧,比如,在精神痛苦时欣赏文学,在遭遇重大不幸的日子里钻研数学。^{[3]643}如果说马克思的这些方法和技巧有其个体的独特性的话,那么如下两种路径应当是具有推广的普遍性。

其一,信念支撑是马克思化解纠结的至强法宝。支撑马克思的信念来自少年时代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人道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的人群共同体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责任担当。1835年秋,马克思在高中毕业考试的作文中所表达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便是那个时代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所教导的人生旨向,马克思在作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11}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的教育是否内化为每个中学生的人生观,我们不能妄加推断,但毫无疑问,它的确是植入了马克思灵魂的深处;宽容而进步的父亲教导更是巩固了马克思这种人生价值观念,在马克思为思恋燕妮而撰写缠绵情书的时候,他的父亲严肃地告诫说“……你担负着重大责任……你虽年轻,但是一个男子汉,一个男子汉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应该用突击的步伐赢得这种尊敬,

还要对他的有恒和对他的未来的认真努力作出保证”^{[2]22}。此外,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对青年马克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入花甲之年的男爵在马克思身上倾注了大量时间,与他谈政治思想,激发了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人格和思想的极大兴趣^{[1]12}……学校、家庭和社会在马克思身上体现的人生信念教育,真正内化为马克思人生中不可剥离的基本品格,使得马克思不论后来遭遇怎样的置疑或灾难,比如,母亲的不解、友人的争吵、世俗的诽谤、生活的贫苦,乃至反动政府的诱惑^①等,都不能改变他的奋斗目标,这样的理想信念也是马克思化解俗世纠结的坚实的精神支柱。马克思在给未来的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2]159}。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向恩格斯说过类似的话:“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1]323}《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并不没有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彻底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苦干半个世纪,可还是一个穷叫化子”^{[5]161},但他仍然不改“为人类工作”的初衷:“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5]161}。在19世纪70年代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工人大会上,马克思说:“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2]256}就连查禁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的书报检察官圣保尔也不得不佩服地说:“马克思愿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1]48}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支撑,马克思的身心经常保持着青春活力,而大凡有幸寻访过这位“红色恐怖博士”^②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既不是一个阴郁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幻想家,他实际上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俗世的人。^{[3]643}

^① 1843年8月-10月间,在出版商卢格聘请马克思编辑出版《德法年鉴》的同时,普鲁士政府试图争取马克思为政府服务,并保证他仕途飞黄腾达,以便使这个可怕敌人因此而不足为患。尽管马克思急需挣钱养家,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多次拒绝了反动政府的诱惑。

^② 从巴黎公社时期起,人们就这样称呼马克思。

其二，幽默调节是马克思化解纠结的情绪砝码。幽默既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不愿被负面情绪控制而乐观面对纠结和痛苦的积极追求。马克思夫妻之间有幽默——爱琳娜曾经回忆道：“……我时常相信，把他们系在一起的还有一根带子——取之不尽的妙趣横生的幽默，这根带子几乎像他们献身于工人事业一样坚强。”^{[2]166} 马克思家人之间也不乏幽默，他们互起绰号取乐，摩尔几乎是马克思正式的名字，另一个绰号是“查理”^①和“老尼克”（魔鬼）。母亲燕妮是“妈咪”，佣人海伦·德穆特有许许多多其他名字，最后叫她“尼姆”。恩格斯被称为“将军”。大姐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和“帝”，二姐劳拉叫“霍屯督人”和“卡卡都”，爱琳娜叫“中国王子可可”和“矮子阿尔伯里希”，最后叫“杜西”。^{[2]167} 就是在身无分文、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时候，马克思仍然乐观而幽默：“一个星期以来，我已经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能赊账，我不能再吃肉”^{[1]240}。正如恩格斯在清理马克思遗物时所说，资产阶级使用各种手段迫害他们，但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屈服，因为“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4]108}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俗世生活已成为过往的历史，我们梳理俗世生活中马克思的诸般纠结，不是要祛魅他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光环，而是要以其原初的生活史充盈他由俗世人脱颖而出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人文品格，让我们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感受马克思生活之艰辛、意志之坚韧，在体悟马克思化解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信念和高度的幽默的同时，让马克思的精神能够关照当代社会中处于生活压力和生存焦虑的人们，以充分发挥马克思留下的另一种精神遗产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 露依丝·多尔纳曼.卡尔·马克思夫人传[M].高国淦,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
- [3] 弗·梅林.马克思传[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4]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E.A.斯捷潘诺娃.马克思传略[M].关益,李荫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马陵合

① 来自英文 Charley, Charleys 是 Charles 的变异,而 Charles 就是德文的 Karl。